

譯者弁言

本書的著者西蒙智博士，是美國的歷史學者而兼國際新聞學家，自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二十年來，對於世界情勢，以銳利的眼光，豐富的智識，發爲精審的言論，恰當的推斷，在國際久負盛名。美尼博士，是研究國際資源的專家，也有獨到的著述。他們二人合著此書，用正確的材料，精密的分析，公正的態度，簡切的筆墨，把支配現代世界的主動力和左右世界前途的重要國家，扼要論述。對於歷史、地理的背景，政治經濟的趨勢，外交的手腕，軍事的佈置，民族心理的起伏，國家政策的變動，都有明確的指示。對於國際現有的癥結，未來的途徑，尤反覆申說，使讀者瞭然於現在的情勢和今後的演變，而知所警惕，知所取捨。故原書出版後，一月之間重印三次，其價值可以想見。

我國在近代中已成世界問題的主要對象，世界情勢與我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息息相關，我國國民的覺悟和努力，亦於世界前途大有影響。無論對內對外，皆須明瞭現代世界情勢，纔能自致於最宜。但關於國際問題的讀品，汗牛充棟，內容複雜，專門學者之外，大都沒有充分的工夫去盡量

閱覽，而國內人士亟欲明瞭現代世界情勢之要求，又至急切。譯者覺得此書提要勾玄，由博反約，爲討論國際問題之佳作，除在歷史上有永久價值外，對於關心國家世界的人士，以及學校之講授，公民之指導，均有相當的裨助，故擇而譯之。惟瑕疵在所不免，尙望讀者指正。

序

自世界受了大不景氣侵襲以後，數年之中，世界和平問題已經起了急劇而顯著的變態。在巴黎和平會議中居於主宰地位的民族自決原則，到了近幾年來由經濟自足原則起而代之，成為舉世所重視的要件；而且往日的各種舊問題是絕對以歐洲各國為對象的，近來的各種新問題，卻將世界各方都包含在裏面。

這本書的主要企圖是把歐洲大戰以後隨即發生的經濟難關，以及相應而生的大不景氣，加以考究，以測驗這種變化所由來的原因和境遇。其目的在證明現在世界和平之岌岌可慮，是由於各個國家民族間的經濟不平等，恰如一世紀以前歐洲和平之不穩定，是由於歐洲大陸上各個民族國家間的政治不平等。

這本書的論據，是說明法西斯主義（Fascism）和國社主義（National Socialism）表面上雖然和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沒有甚麼分別，可是在骨子裏，至少在其最近的階段上，是具有特點

的特點是甚麼呢？就是各大民族因爲本國的天然富源不足而影響到國家民族的繁榮，於是乎不得不起而反抗，以突破其所受的種種限制而謀發展。所以本書著者所抱的目的并不是要證明新的世界戰爭已經到了不可避免的程度；只是要指示有計畫的和平保障，尙無適用制度產生，將現在物質分配不平的狀況作爲基礎，以求解決方法。

到了最近，各國間的主要工業原素之多寡，已經是很懸殊的了，而得天獨厚諸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所運用的手腕，尤足以加重這種趨勢。所以在歐洲，有些國家中（至少如德意志如意大利）政府和資本階級都走到緊要關頭，所碰着的問題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以戰爭從事征服；其二是讓國內現行組織瓦解而入於共產主義。因此之故，德意志和意大利就汲汲於訓練民衆以準備戰爭了。

本書的用意，是要闡明以下各點：其一是列強間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真實狀況及其差度之大；其二是分配不平等的結果，對於天賦較富的國家發生很嚴重的影響，使其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都感受劇烈的痛苦；其三是如果沒有獲得和平的方法去排除這些不平等的事實，使身受其痛苦

的人忍無可忍，那嗎這種狀況存在的期間，要避免新戰爭之發生，簡直是一種空想而已。此外本書還有一種意思，就是要說明歐洲大戰結束後保持和平的各種實驗。因為在實際上，這些工作不但沒有把現存的經濟病根除去，反而使之延長起來，以致諸大民族（至少為德意志人、俄羅斯人、意大利人）歸於失望，寧取暴烈動作，而不願忍受不平等的狀況。

本書之作成雖由西門君執筆，但常常與愛美尼君下商討的工夫，而且由愛美尼君供給經濟方面的材料以及許多圖表。此外如作成簡明圖的彼得孫女士（Michel Peterson），付諸石印的巴克爾女士（Phyllis Parker）和指導出版的湯姆遜夫人（Lowell Thomson），也是應該於此致謝的。一九三五年二月，西蒙智（Frank H. Simonds）

導言

自從巴黎和會的條約生效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中間共有十六年的光陰，這段期間天然分爲三個界限顯明的時期。每個時期的長度差不多是相等的，而且各時期都有其特點。第一是佔據魯爾區（Ruhr）時期，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五年。第二個是洛加諾條約（Treaty of Locarno）時期。第三個是希特勒（Hitler）和國社黨在德意志興起時期。第一個時期和第三個時期之內，都有反抗的動作。第二個時期中，卻有光明的改造。反抗的開始，是由德意志人民不堪凡爾賽條約的束縛而產生的。他們本於直覺的心理，激昂的氣慨，起來打破巴黎和約所加的鎖鏈。這種企圖，自然而然的與法蘭西處於直接衝突地位，其結果釀出法國佔據魯爾區的行動。在德意志方面，這種失敗所生的損害，比其在世界大戰中所遭的失敗與損害還要嚴酷些。

德意志人民失敗後，仍然迫不得已而求和。可是在這個時期中，他們國內幸而出了一個大外交家斯特拉斯曼（Gustav Stresemann），此人既有手腕，又有眼光，較之當年的俾斯麥還勝一籌。

斯特拉斯曼以敏銳的觀察，深知德意志在凡爾賽和約的束縛之下，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纔可望獲得自由；而國內的直接問題，須要設法避免的，就是世界大戰失敗和魯爾區被佔兩大國難所引起的社會危險；因此斯氏當國，就以渡此難關爲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的基礎，苦心焦思加以運用，一直到他死的時候。

所幸在一九二五年，不但大不列顛在戰爭心理的朦朧狀態中抬出頭來，就是法蘭西也突破了這種迷網。北美合衆國此時，雖仍然決心與舊世界不發生一切政治聯繫，卻願在金融方面參加復興歐洲的工作。而且法蘭西的政治家白里安（Briand）和大不列顛的政治家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也受了新精神的鼓動，準備與斯特拉斯曼合作。

在這樣的政治舞臺上，政策就完全改變了。改變的表徵，就是一九二五年秋天在洛加諾簽訂了許多協議。這些協議，把凡爾賽和約中所存的各種疆域爭執停止，所沒有解決的只有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問題；關於這一項疆域爭執，德意志自動放棄其要求。德意志當初從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取得這個地方，後來又從凡爾賽條約喪失這個地方，此時

都置而不論了。大不列顛和意大利，此時俱挺身而出，願保障萊茵河 (the Rhine) 現狀 (Status quo)，使德意志與法蘭西劃萊茵河而守，彼此不得侵越。

一九二六年秋天，德意志進而加入國際聯盟繼續至數年之久，所以在一九二九年斯特拉斯曼逝世及同年英國保守黨內閣解組之前（張伯倫即屬於保守黨內閣），日內瓦便成爲這幾個巨頭密切聯合以策動歐洲政治的場所，在這幾個巨頭之中，白里安就被認爲首腦人物。這些政治家的主要意向，是要恢復和平，重建繁榮。而重建德意志的繁榮，尤爲其中的首務；因爲德意志如果得着新環境去謀比較適當的生存，其結果必然要重演凡爾賽條約成立以後洛加諾條約成立以前的暴烈行爲，那是不言而喻的。

在一九二六年以後的幾年之中，經濟的恢復是很快的，而且因爲德意志人重見繁榮之故，他們在戰敗受屈和喪失魯爾區時所生的憤慨和失望，也就大大的減少了。歐洲的空氣，在不知不覺之中完全轉變，於是全世界都瀰漫着一種信心，以爲純正的和平已經回復了，人類可以依賴國際聯盟爲防止未來戰爭的有效工具了。

孰知此種新結構，并不是建築在堅岩上的，乃是建築在鬆砂上的。因爲此時德意志的繁榮，是依靠美國和英國的借款大批流入而產生的，并不像早年的德國，靠着本國工商業的神速發展和貿易的增殖而產生的，所以這一度繁榮，究竟不能算是實際恢復了大戰以前的興隆狀況。此時的德意志，雖然因爲外債的資助，能夠從外國購得必要的原料品，使國內的工業機械盡量發展其生產的效能，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既要向外國購買所需的原料，又要把生產品的代價用去支付賠款，甚至於要把所生產的貨物直接用去抵償賠款。凡此都足以證明德意志此時的繁榮是虛幻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九年英美同時突然停止貸款的時候，保障德意志繁榮的基礎條件一旦喪失，又加上悲慘的債務清償，廣即演成德國生產崩潰的現象，全國經濟生活就從此瓦解，一直繼續到現在還沒有恢復起來。斯特拉斯曼慘淡經營的進行計畫，也就因之全盤摧毀，因爲他這種進行計畫所依據的基點，有一個主要的設想，就是只要德意志能忠忠實實的接受凡爾賽和約中所規定的條件，就可以與舊時的仇敵國家互相聯絡而求得物質的繁榮。然而至此竟成泡影了。

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一年的大不景氣發生以還，金融凋敝，經濟疲滯，更使德意志人民的心

目中明瞭斯特拉斯曼的政策是錯誤的，無論用何種努力去履行凡爾賽和約中的條件以求生存，是不行的。於是他們又另外作一種新反抗，這就是以希特勒（Aldof Hitler）爲主動的國社黨和此黨所推行的國社黨政綱。

從事實的眞象探求起來，德意志的新情況雖是凡爾賽和約作俑演變出來的，可是這個和約的影響只算得一小部分。使德意志在此時感受痛苦的根本原因和主要成分，還是由工業革命後期的結果發生出來的，所以不能完全歸之於世界大戰的直接影響。換言之，就是德意志所遇的困難，是經濟的，不是政治的；要解除這些困難，也不僅僅是重定疆界或排除國防設備上的限制所能辦到。

德國所受的災難，實際上只算是世界大災難的一小部分，然而在德意志人民的眼目中看起來就不同了；他們已經有種種夙仇舊恨橫亙於心中，加上新生的苦辛和落伍的惶恐，便使他們的情緒愈趨極端；雖則他們實際的痛苦是本國物質環境的先天缺憾所致，可是他們心理總離不脫從前的窠臼，每每把洛加諾條約成立以前的作戰口號反復表示。他們的意思是：凡爾賽和約給他

們加上種種侵害，所以排除這些侵害乃是他們的正當要求。殊不知縱然戰勝國能够給他們以公道，依舊無從使他們預期的繁榮降臨。

於是，暴烈手段就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而歐戰以後的第三個時期，就以這種現象爲主要的形勢，現代的和平問題，也以此爲樞紐；不但歐洲如是，即全世界亦莫不如是。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必須回顧到滑鐵盧戰爭和馬倫河（the Marne）戰爭以前的狀況。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政治的演變和經濟的演變，與英、美、法三國革命所標揭的原則是步調相同的。這些原則，構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立國的大道。凡一國中的公民或庶民，不論其階級如何，境況如何，在政治權利方面和財產保障方面，都規定同一的平等待遇。

這三國的革命所得的最終結果，都是把貴族階級從封建時代承襲來的政治權力剝奪，移轉於本國的羣衆去享受。而且在世界大戰告終的時候，大多數的國家都採行了普選制度，以大多數人的傾向和利益爲施政之本，因此統治權屬於羣衆的方式，便成立起來。

在相同的時期內，工業革命也把世界的環境改變，使之趨於繁榮。舊時的社會，是以土地爲主

要生產原素的，所謂羣衆，大部分是居於鄉間親自耕種的農人；自從工業革命以還，這種情形漸漸演變成另一制度，其特色是城市人口擴張到很大的數目，羣集於工場和礦坑附近，以僱傭關係爲其成立要件。同樣，舊時以主持貿易和支配商業爲本務的經商階級，漸漸變爲資本家，現代的新式生產工具，就歸入他們的掌握。

如是而構成的資本與勞動關係，在世界大戰以前，大體上是沒有顯然分裂的。不過資本階級因爲得着工業迅速發展的利潤，財富便增加起來；勞動階級因爲生活標準不斷的增高，也享受相當的利益。在此兩種階級之間產生出來的政黨，就造成一種權利平衡的作用。這類政黨的經費來源，是要靠資本家供給的，在選舉的時候，卻要靠無產階級投票。所以黨員們一方面保護資本家，使其財產不受立法上之妄事徵取，一方面也要保護勞動者，使之不受過度的榨取。

因此之故，在世界大戰以前的時期中，社會上真正的爭點，還不在乎財產之分配，而在乎擁有資產者與勞動者之間應如何分配其利潤。後來勞動階級見着自身的情形逐漸改良，自己的兒女可以得着更多的機會，他們就覺悟政權之中可以得着力量，數十年來，這種覺悟不斷的增長。當時

全部社會制度是流動的，社會中雖然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不平等情形，但是這類不公道事態，還沒有到不可救藥的程度，工人們也可以用拿破崙的衛隊（grouards）所用的標誌，與陸軍上將所用的相同。

可是，在世界大戰以後，俄羅斯革命即採用馬克斯（Karl Marx）所定的方式，就把全部民主制度廢棄了；以勞工專政代替政治自由制度，以國家公有代替私有財產制度，以世界共產社會代替民族國家社會。這種三位一體的計畫，是要從私人的手中把生產工具奪過來歸諸國有；是要使生產事業絕對由工人指導管理，並且以工人的利益為大前題；是要使舊時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歸於泯除，而代之以全世界一致的勞資階級間之競爭。

共產主義所喊出的鬪爭口號，便對於擁有私產的資本階級發生直接恐嚇。因為在民主制度之下，大多數政治的權力已由採行普選制而有切實的表現。既然如是，英法等國的工人，只須把現存的政治機構攫取在手內，便可以步俄羅斯的後塵去摧毀資本制度，其他各國的工人，只要願意這樣做，也未嘗辦不到。換言之，就是他們可以用一種新的革命戰術去代替大戰以前的革命程序。

了。而且一切軍隊的軍實，其出產之權既然操在工人階級手內，如果在舊制度之下，一旦要使他們出去作戰，他們起而反對是很可能的，所以新革命的發生也很容易，因此舊制度中所潛伏的危險種子，就處處可以爆發了。

然而，從事實上觀察，在英法境內，卻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而且協約國的政府因為受了赤色革命的恐嚇，大起驚惶，反暗中資助白俄從事戰爭去抵制赤俄。但是，這些舉動終於沒有達到他們的企圖。同時，俄羅斯的革命也和從前的法蘭西的革命一樣，雖然把對內的統治鞏固起來，對外的戰爭卻未能如願以償。一九二〇年紅軍在波蘭的華沙（Warsaw）城下遭了失敗，布爾雪維克（Bolshevism）的對外戰鬪力便受了摧殘。於是西方的民治國家和東方的革命國家，廣即訂立休戰條約，劃定疆界，各不相犯，這便是里查條約（the Treaty of Riga）。

俄羅斯的布爾雪維克黨人雖然在戰場上遭了失敗，并未立刻放棄其鬪爭的企圖。他們又變更策略，指使各民治國內的共產黨徒去策動世界革命，并供給各處的妨工運動和罷工運動。不過這種進攻的方式也和上次的軍事動作一樣，對於經濟機構強固的西方國家難操勝算。因為在這

些國家境內，工人對於布爾雪維克黨人的過激舉動是不贊成的，所以不願意步他們的後塵。而且勞工對於民主主義的信仰，既仍然保持忠實的態度，資產階級也就不願意捨棄他們。

至於意大利的境內，卻具一種全然不同的情形。因為國內經過大戰的長期疲敝，使其根基不固的經濟環境凋喪到不堪忍受的程度，因之國內的大衆發生了澈底不安的狀況。加以意國在大戰中雖然獲得勝利，而她在和約中所受的報酬卻甚微少，國人失望的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退伍的軍士更覺得忿不可遏。於是一方面發生強烈的左傾運動，一方面復發生激昂的國家主義思潮。莫索里尼（Mussolini）便在這種思潮之中崛起，領導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當此時期，意大利的金融、實業和大工業，因為國內的議會政府，處在經濟衰落社會騷動的惡劣環境中，顯然不能維持秩序保障繁榮，大家都惶恐起來，只好決心和莫索里尼站在一條路上，追隨他的法西斯運動而行。趨於法西斯主義之下的意大利人，可以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有產階級，他們的動機，是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獲得財產的保障，這是馬克斯早已預料着的；還有一類人，是在資本制度之下，獲得利益和社會地位的，因為不願意與從事手工的勞動者聯合，自然也只有

趨於此途；又有從馬克斯的時候起就發展出來的新中產階級，此時處於僱主的地位，因為他們的財產起了恐慌，也不得不謀保持其地位。法西斯主義得了這幾重生力軍，便在國內佔了優勝地位。因為要顧及國家民族的強大和國境內的秩序，便把自由主義犧牲了，以謀達到這兩重意願。

一九二二年意大利國內發生的事情，差不多是重演一世紀以前法蘭西國內所發生的事情。當時法國的中產階級造成大革命而把貴族政治推翻以後，不堪共和制度的各種過分行爲之擾，在混亂的局面中又起來擁護大執政推翻共和而建立帝國。在一八〇四年，拿破崙就實行這種任務，恢復國內的和平與秩序。在一九二二年，莫索里尼也負起同樣的使命而行。這兩個事例的主動人物，都是富有天才的，因之他們的特殊人格，便籠罩於全般行動而發揮其獨具的性能。

莫索里尼也和拿破崙一樣，以增長國家的固有光榮爲博得國人擁護的要件。他要把自由的意大利改變成偉大的意大利。他的事業導源於加富爾（Cavour）統一復興運動（Il Risorgimento）；他把挺進隊開到羅馬（March on Rome）是重演六十年前千人軍（the Expedition of the Thousand）征服西西利（Sicily）的精神。所以昔年的加里波的（Garibaldi）成爲意大利

利統一的象徵人物，今日的莫索里尼就成爲意大利臻於偉大的化身。

莫索里尼掌握大權之後，也像拿破侖一樣，把國內舊有的政治組織盡量掃盪，因爲這些組織存在，是他的統治權所懼怕的一種永遠危險物。他把議會取消了，把言論自由停止了，把出版物統制了。他爲防制工人以投票方式樹立共產黨的統治起見，更把工人的投票權剝奪了。這種內部更張，全以嚴厲狂熱的國家主義之名義行之。舉凡意大利在世界大戰疆場中所未取得的權利，在巴黎和會席上所未能遂意的光榮或報酬，換言之就是民主主義所未能達到的目的，法西斯主義都許以一種新期望。

法西斯主義與具有國際性質的共產主義針鋒相對，而成爲意大利的國家主義。列寧 (Lenin) 的革命，是從橫的方面使全世界的工人一致聯合起來；莫索里尼的革命，是從縱的方面使意大利民衆中各層階級一致團結起來。共產主義號召各地的民衆趨於紅旗之下，去作階級戰爭；法西斯主義集合意大利人立於薩伏依王朝 (Savoy) 的三色國旗之下，去作民族國家的新戰爭而求勝利。這兩種主義，都有一個相同之點，就是反對民主主義。俄羅斯的革命，把民主主義摧毀了，